

◆ 周兴陆 著



诗歌评点与理论研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黄霖先生七秩华诞纪念文丛

诗歌评点与理论研究

◆ 周兴陆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歌评点与理论研究 / 周兴陆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506-0632-6

I. ①诗… II. ①周…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2728号

书 名 诗歌评点与理论研究
著 者 周兴陆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句容市春城镇南 邮编:212404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6
字 数 430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632-6
定 价 56.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1-8787113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中国古代诗歌评点研究”项目成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杜诗精神的传承”项目成果

序

赖力行

2011年第一天,打开邮箱,就收到周兴陆寄来的书稿,希望我能在他的这部书稿写点什么。兴陆从华中师大硕士毕业后,投在黄霖老师门下,在学术的道路上辛勤耕耘,每当看到他取得的成绩,我内心都会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元旦过后,长沙接连下了几场几十年难见的瑞雪,岳麓山雪花飞舞,窗外积雪盈尺,围炉读兴陆的文章,和出门踏雪赏梅一样,都特有兴味。

这部《诗歌评点与理论研究》意在建设现代性和民族性的中国诗学,全书的“嘉言”都聚焦于这一总的“宗旨”。上篇“文论审思”,依托现代学术提供的思想资源,审视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个性,探讨传统诗学演化的内在动力,提出建立有实践品格和个性化的中国当代文论的构想。上篇的系列文章中凸显出来的问题指向,和几近口号化的“古代文论现代转向”不同,是在扎实的文献考索的基础上,对古代文论蕴含的特质及其自身发展动力的研究中形成的。兴陆对古代文论内在品格的思考,既有对古文论材料的令人信服的阐释,又有对20世纪知识背景置换以来古文论领域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反思,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思考如何建设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中国文论,视野既比较宏通,也得见材料实证的扎实功夫。古代文论如何为建设汉语文学(或曰“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提供本土资源和中国问题,首要的是对中国文论能否古今贯通的考察。由于思维方式的民族根性和古今汉语的文化特性在近代文化转型中并没有彻底断裂,中国现代文学批

评家和传统批评之间出现变异的同时,必然存在着由文化和语言制约的继承和贯通。古代文论的观念、方法在现代知识的背景下不断地被理解(给予现代学术的解明)、被吸收(“古典”与“现代”之间的通融)、被印证(古今文学批评的可对应性)。这就形成了绵延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与转化。周兴陆进一步提出了诗学演变的“内在动力”,强调外在的社会文化哲学思潮,往往通过影响诗学内部的矛盾关系的平衡而转化为内在动力,推动诗学的演变。我认为他的观点和论证回到了文论发展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谈“现代”转化。这就使“古代文论转化”的难题得到一种崭新的解答。

如果说“上篇”是对中国诗学建构的宏观审视,“中篇”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评点”的体制和方法之中观考察。中国古代的诗人、诗论家很少离开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去作抽象的理论概括和提炼,他们的诗学发现总是寓于批评实践之中,我们研究古代文论,也要与之对接,即回到古代文论的实际存在方式中去。“评点”既是一种随文批评的体制,也是一种独特的批评方法。台湾学者单德兴研究评点在阅读活动“之前”和“之中”的介入,指出评点使读者的阅读过程结合了读者与文本的互动、读者与评语的互动,令他的导师——读者反应批评的奠基者伊瑟尔大开眼界^①。周兴陆对古代文学评点的研究,主要着力点在实证,即把文学评点的史料弄准确。刘辰翁《世说新语》的评点,是文学评点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本,但大陆学界仅知其名,未见原本。凌瀛初提到的“辰翁、应登两家批注本”,现存台湾“中央”图书馆,周兴陆在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查阅到台湾藏本完整的胶卷,并对刘辰翁评点的来龙去脉,作了细致的考辨,解决了大陆学界的一个文献难题。兴陆攻读硕士期间就在华师学报发表过关于研究刘辰翁评点的论文,很早就关注刘的《世说新语》评点本,却始终没有找到,这个

^①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第 382 页,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纠结,一直留到去哈佛访学。

相当于“中篇”立足于文学评点的文献稽考,“下篇”则是对杜诗评点史的梳理和杜诗评点文字的理论阐释。杜诗成为和《诗经》并肩的经典,有赖于评点。“千家注杜”,一多半是以评点的形式存在。周兴陆对王夫之、金圣叹等人的杜诗评点的研究,对杜诗接受模式的概括,对杜诗成为经典的历程及其原因的分析,在杜诗研究中别具一格。究其原因,作者既有对杜诗的阅读积累,又有包括接受美学等现代文学理论资源的接受、消化和运用,而且这种运用契合于本土文献,是一种“对话”而非“套用”。

兴陆 1994 年负笈武昌,攻读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的硕士学位,当时华中师大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的老师,给研究生开出的课程既有古今贯通的“圆形批评”,又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当代西方文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这个学术群体的熏陶,奠定了兴陆文艺学的基本素养。后来他进一步到复旦深造,受到更为严谨的训练,逐步形成了古文论研究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指向。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文集,就是他跋涉在学术道路上的印记。

兴陆在华师硕士毕业时,就业形势很好,但他一心向学,选择了读黄霖老师的博士。现在看来,他的天赋、积累很适合做学术。当然,做学问不容易,在中国做中国学问更不容易,还有很多的难题在等待着兴陆解答。我祝愿他取得更多的成绩。

2011 年春节于长沙岳麓山寓所

逆境中的他还关心着别人：“只愿你好好过日子。”信的结尾，又不乏天真和幽默：“我们太容易老了，能在年轻时荒唐一点就不妨荒唐，不要太老成”。可见，他非但不对自己的“荒唐”后悔，而且还好言相劝别人“不要太老成”，可见他的执著情怀。

章草是我国有2000年历史的古书法。据张怀瓘《书断》载：“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南朝宋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北宋黄伯思《东关余论》曰：“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称草，犹古隶之生今正书，故章草当在草书先，然本无章名，因汉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书，帝（章帝——作者注）称之，故后世目焉。”以其施于奏章，故曰章草。可见，章草因章帝的承认而得名，也因章帝批用于奏章而达到了高潮。到了近现代，秉承传统章草之精华，而又自成一体者寥寥无几，沈从文的章草深谙隶意，融通汉简，创新今草，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不失为今世章草之神品。

其实，沈从文早在年轻时其书法成就就已被公认，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为年轻的殉职部属立碑，为其碑书丹者就是沈从文。多年后，书法家黄苗子看了沈从文书丹的六尺碑文拓片后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做书法。”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文坛，沈从文的书法亦是高雅的尚品，1929年10月，作家、诗人施蛰存新婚，沈从文与友人胡也频、丁玲夫妇的贺礼便是沈从文用鹅黄洒金笺书写的横幅“多福多寿多男女”7个很有功力的章草。

沈从文在家乡读小学时是“逃学记录最高的顽童”。小学毕业后参加了当地的军队，在担任有儒将之称的靖国联军第一军统领官陈渠珍书记期间，有机会为陈读书和观赏陈收藏的古画、古铜器以及古书、碑帖等，认识了许多文物的名称和价值。其间，沈从文还进入陈渠珍设立的民治报馆，接触《民治报》的编刊工作，这是他最初的编辑生涯。对于这段有文学艺术启蒙意义的生活，他后来在自传里回忆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的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认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五四运动的余波和其罹患的一场四十天的大病以及好友陆弢的溺水死亡深深地刺激了二十出头的沈从文。经过四整天的思考，他终于决心离开军队，离开乡里，去北京“找理想、读点书”，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23年夏，初到北京的沈从文近距离接触了有古代和现代博物馆之誉的琉璃厂，读到了《新青年》等新文化刊物，转而去北京大学旁听，并开始练习写作。1924年，沈从文的习作初次在《晨报》上发表，并开始与郁达夫、徐志摩、胡也频和丁玲等交往，尔后陆续发表散文、小说等，开始了职业创作生涯。1928年，他从北京到上海编刊物、写小说并与巴金等作家交往。1934年后，沈从文先后发表了《边城》、《湘西散记》等充满人文情怀和乡土气息的小说和散文，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沈从文伴随着灾难中的祖国流离于昆明、香港、重庆等地，虽然生活颠沛，

关于高棅诗学的两个问题	190
高棅诗学二题	199
《沧浪诗话校释》据“玉屑本”校订献疑	209
从汉魏思想到陆机的“诗缘情”	220
中篇：评点研究	233
应该加强文学评点研究	235
上海图书馆藏郑文焯手批《陶渊明全集》真迹本	237
关于谢灵运诗歌的若干文献问题	247
《世说新语》刘辰翁评点考辨	258
明代《韩诗外传》评点二种	275
明代吴兴闵凌套印与诗歌评点的传播	283
孟郊诗集的三种批点本	303
黎简手批《昌黎先生诗集注》	313
一部湮没已久的《李贺诗集》笺注本	322
李商隐诗歌评点的若干文献学问题	330
翁方纲评点《山谷外集》辑考	345
翁方纲手批《渔洋山人精华录》考辨	352
梁章钜《读渔洋诗随笔》考释	364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维方式及其演进	373
下篇：杜诗评点史论	381
杜甫诗论的诗学史定位	383
宋代杜诗研究的基本模式	398
试论杜诗的正典化	408
“诗史”之誉和“以史证诗”	417

从《沧浪诗话》“于诗用健字不得”考辨严羽评杜甫	427
杜诗“变调”说	436
王夫之的杜诗批评	445
从杜诗接受史考察黄生的《杜诗说》	452
金圣叹杜诗批解的文学批评学透视	463
吴瞻泰《杜诗提要》研究	470
鲁一同《通甫评杜》琐谈	488
跋	501

上篇： 文论审思

古代文论现代化之审思

为了避免陷入关于“现代性”、“现代化”的纷繁纠缠,本文题目的“现代化”意指:古代文论如何进入 20 世纪的现代文学思想视野,如何参与 20 世纪的现代思想演说。

中国文化,在一百余年前的世纪之交,面临着古今、中外的复杂胶葛。“整理国故”,将传统文化放在价值重估的审判台上,作出“死”“活”、“新”“旧”的判别,乃至后来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论,都是站在现代的门槛检查传统的身份。这是古今之辨。另一方面,不论是“中体西用”、“保存国粹”,还是“全盘西化”,不论是迎接还是拒斥,中国文化都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凌轹。这是中外胶着。而且,有时这两对矛盾是错综在一起的,甚至“中”就是“古”,“外”就是“今”,“古今之辨”常演化为“中西之争”。古代文论进入 20 世纪,也是置身于这种复杂的文化环境中。现在回头去探索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进程,需要联系这种文化环境来考察。

一、“古代”文论是通过不断调整它丰富的姿态而跻身于“现代”思想的

历史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而是万川竞流。历史的流脉,有强弱显潜之分:处于弱勢的潜流,在一定的时势条件下会衍生、发展为强势的显流;反之,强势的显流发达到一定阶段,也会渐趋没落,消焉为潜流,甚至断流。中国古代文学和理论的发展,无不印证这条规

律。这条规律也适用于 20 世纪的中国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发展至清中期，“格调”与“性灵”、情与理的矛盾，在沈德潜和袁枚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稍后的龚自珍无疑是站在尊情、标举性灵一边的，而晚清思想的主导趋势，则是调和性灵与格调，二者相济为用^①。“性灵”理论，本来就是以“不拘格套，独抒性灵”为锋芒的，与格调的调和，正是以丧失“性灵”的理论独特性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思想体系内，“性灵”文学理论虽然在明清时期一度活跃，然而尚不足以撼动以沈德潜诗学为代表的，体现正统意识形态的“温柔敦厚”论、“格调”论。然而在近代思想背景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周树人 1908 年以“令飞”笔名发表的《摩罗诗力说》，鼓吹西方拜伦等的浪漫文学精神，抨击“温柔敦厚”、“思无邪”等传统儒家文学观念，看似是在引介国外文学思想，其实是自公安“三袁”、廖燕、袁枚，特别是龚自珍以来“性灵”文学思想合理发展而至近代的飞越。或者可以说是传统文学批评中“性灵”文学思想和儒家正统文学思想之间矛盾对立关系在近代的质变。在传统体系内，“性灵”文学思想受到儒家正统文学思想的抑制，而处于潜流弱势，即使有袁枚、龚自珍等人的振臂高呼，也未能改变这种力量关系。而在上世纪的头十年里，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性论思想的启迪下，借鉴浪漫文学精神的鼓吹，传统的“性灵”文学思想得到助力，一跃而起，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冲决了传统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而逐渐成为文学思想的强势和主流。

学术界曾过于夸大现代与古代文学之间“断裂”的一面，认为现代文学思想更多是自西方植入进来的。其实，如果没有“性灵”文学思想在明清三百年的发展所形成的文化土壤，很难想象“五四”时期“情感文学观”、人性论文学观能在中国文艺思想界普遍开花。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人性论文学观念本身是丰富多彩的，而“五四”时期国人在引介和传播时更为注重反对封建专制、争取爱情自由等内

^① 如沈道宽《六义郭郭》云：“谈诗者之聚讼，无过性灵、格律，二者不可偏废也。舍性灵而言格律，是为土木形骸；舍格律而言性灵，必至緼弃规矩。”

容,实际上也是带着中国问题,以本土语境来过滤西方文化的。“五四”以后一段时间里的“人性论文学观”,与其说是自西方而来的,不如说是传统“性灵”文学思想在外来思想刺激下的新发展。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著作都可以从明清思想文化中寻其理论源头,特别是《新文学的源流》,把“新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公安派,正显示了“五四”新文学思想与明清“性灵”文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周作人用“言志”和“载道”来分解中国传统文学思想,或许这种分解本身有其缺陷,但这正表明现代文学思想与传统之间并非断裂,而是传统文学思想中被“载道派”压制的“言志派”(性灵派)在现代背景中翻了身,灌注于现代文学思想之中,成为文学思想的主流。

通过对“性灵”文学思想的古今演变的粗略分析,可以看出,传统文学思想自身发展中有新动向、新苗头,它构成了新文学思想的源头。新文学思想的个别观念尽管有可能直接来源于国外,但也是从中国问题出发去经过过滤而“拿来”的,并与中国自身思想发展相结合。换一句话说,传统文学思想是多样性的,它是以儒家正统文学观的黯淡、性灵文学观的激活这一姿态跻身于现代文艺思潮的。如果说古代文论存在转换的话,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现代文艺思想的产生,正是“转换”的成功范例。

传统文学批评关于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基本理论是“讽谏”、“美刺”说。它源于先秦,在汉代《诗大序》中得到全面的阐述。一直到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不识时忌讳”、苏轼的“言必中当世之过”云云,都是对儒家传统讽喻文学思想的发挥。讽喻文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内部的矛盾而强调文学应该揭露时弊、反映现实政治制度和统治的不合理。这种讽喻文学思想或隐或显地灌注在历代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之中。但是,自宋代以后,社会矛盾有了很大的变化,民族矛盾日益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南宋的诗文创作中已经强烈地表现出鼓吹民族志气、抨击投降主义、反抗外来侵略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内容是在儒家“华夷之辨”的正统思想中可以找到渊源的,但是却超越了“讽谏”、“美刺”文学思想的范围,也可以看作是传统儒家文艺功用论的新发展。其理论代表是明清之际的陈

子龙、钱谦益和黄宗羲。陈子龙论诗之本“盖忧时托志者之所作也”（《六子诗叙》）。钱谦益说：“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气也。忠臣志士之文章，与日月争光，与天地俱磨灭。然其出也，往往在阳九百六、沦亡颠覆之时。宇宙偏沲之运，与人心愤盈之气，相与轧磨薄射，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①深受钱谦益影响的黄宗羲说：“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在平时，昆仑旁博，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浹于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垒愤激汗，而后至文生焉。”^②这些思想虽然与传统的“变风”、“变雅”说有一定的联系，但又非“变风”、“变雅”说所能限，而具有了时代的新内容，这新内容就是在论诗歌与时代关系时，从诗人一己之坎坷遭际扩大到整个时代国运阳九百六、穷极生变的危乱之世；此“厄运危时”，在明清之际表现为神州陆沉，异族入侵，天地闭塞，天地自然的道义理法被打破，被阻遏，必然激发有识之士挺立傲然的主体精神，与悖谬的时代相对抗，曲折执拗地彰显这种在道义上不可违拗的天地自然元气。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一种抨击黑暗、抵御篡统、扭转乾坤、伸张正义的政治精神。这也是传统文学功用论的新内容。

到了晚清，民族矛盾的性质又有了新的变化，面对海外列强的入侵，文学思想上经世致用的精神再度高涨，出现了张际亮、黄遵宪、林昌彝、刘存仁、王松等一大批注重文学“干预时政”、“兴革政教”的理论家。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意专主‘射鹰’”，谐音“射英”，记述人民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壮丽诗篇，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近代中国，东南处于西方列强入侵的前沿阵地，遭受的蹂躏最为悲惨，苦难最为深重，经世致用的文学精神也最为高涨，除了林昌彝外，还有台湾诗人王松的《台阳诗话》、魏秀仁的《陔南山馆诗话》、洪弃生的《寄鹤斋诗话》等等。每当国难危急时，这种抗争的火

^① 钱谦益《纯师集序》，《初学集》卷四十，四部丛刊影印本。

^② 黄宗羲《谢翱年谱游录注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焰就会再次燃起，成为民族文化不屈的脊梁。至1909年南社成立时，更是以诗歌作为宣传民主思想、进行政治革命的武器。高旭《愿无尽庐诗话》，号召诗文“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要求文学发挥关切时政，抨击弊政，唤醒民众的作用，服务于时代的主旋律和大问题，将文学的经世精神提到新的高度。这些关于文学功用论的新思想，是传统儒家文学思想的合理发展。

当然，在传统语境中，这种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尚未能彻底摆脱“温柔敦厚”等思想的束缚，如邱炜萋的《五百石洞天挥麈录》依然说：“温柔敦厚，诗之体；兴观群怨，诗之用。此八字被老生常谈，已成口头禅。苟细思之，千古作诗、谈诗者，又谁能舍此八字立脚。”直至20世纪，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的时代中，应运而生的“革命文学论”、“抗战文学论”，才真正摆脱儒家“温柔敦厚”论的束缚，而将文学经世致用精神提升到新高度。这些并非都是外来思想的产物，放在中国文学古今一贯的传统中看，其实是中国文论文学功用论在20世纪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我们既要看到它“新变”的内容，也要挖掘它自身的文化根源。

二、“以西释中”模式及对它的警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规律不仅表现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在非对等的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关系中。20世纪中国思想界所置身的基本文化语境是西方强势思想文化的侵袭。面对这种侵略，传统文论一般都是通过“重释”而进入现代思想演说，这种“重释”的最基本模式是“以西释中”。1919年，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三号《译书感言》里提出：中国的学问和西洋人相比，差不多有四百年上下的距离，但是，我们只需几十年的光阴“就可同在一个文化的海里洗浴了”。所需的方法是“他们发明，我们摹仿。他们‘众里寻他千百度’，我们‘俯拾即是’。所以我们虽然处